

穆斯林兄弟会与沙特关系的演变及影响

陈丽蓉

摘 要：自 1932 年沙特建国以来，穆斯林兄弟会在沙特经历了初步发展、扩张和衰退三个阶段。二者从合作与相互利用的盟友关系逐渐演变为疏远与对抗的敌对关系。一方面，逃亡到沙特避难的穆兄会成员曾在帮助沙特政权反制埃及纳赛尔政权、推行泛伊斯兰主义战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穆兄会成员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沙特宗教政治反对派的兴起，影响和培育了一批接受库特布思想的极端分子，对沙特政权的稳固及其国家安全造成了冲击。中东剧变以来，穆兄会势力的壮大削弱了沙特的地区影响力，制约了沙特外交政策的实施，导致沙特面临的地区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穆兄会与沙特关系的破裂直接反映出前者对沙特内政外交构成的威胁，是穆兄会思想与瓦哈比教义内在矛盾的逻辑结果。

关键词：沙特；穆斯林兄弟会；瓦哈比派；泛伊斯兰主义

作者简介：陈丽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 2016 级博士研究生（北京 102488）。

文章编号：1673-5161(2021)01-0023-21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2011 年以来,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成为影响中东地区格局走向和国际关系变动的重要因素。2017 年 6 月,沙特以卡塔尔支持和资助“恐怖组织”及穆兄会为由而与卡塔尔断交。穆兄会之所以被沙特列为“恐怖组织”,并成为海湾地区发生外交危机的因素之一,与穆兄会在海湾地区的扩张及其对海湾阿拉伯国家造成的影响有关。截至目前,国内外学界已对埃及、叙利亚、约旦、卡塔尔等国的穆兄会及其分支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对穆兄会在沙特的发展状况及其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国内对于沙特和穆兄会关系的研究,散见于伊斯兰激进主义和沙特现代化的相关论著中。^① 在国外研究成果中,斯蒂芬·拉克鲁瓦(Stéphane Lacroix)细致梳理了穆兄会在沙特的发展历程及其对沙特“觉醒运动(Sahwa Awakening)”的影响,并持续跟踪研究了中东剧变以来沙特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和穆兄会在沙特的发展状况。^② 奥利维尔·罗伊(Olivier Roy)分析了 20 世纪 80 年代穆兄会和沙特在阿富汗进行的合作以及海湾战争后二者关系恶化的历史过程及其原因。^③ 以托马斯·黑格海默(Thomas Hegghammer)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穆兄会是导致沙特伊斯兰主义运动兴起和宗教极端主义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④ 本文通过梳理穆兄会在沙特的发展及其与沙特关系的演变,试图剖析穆兄会对沙特内政外交的影响,进而分析穆兄会与沙特关系破裂及其被沙特列为恐怖组织的原因。

一、穆兄会在沙特的发展历程

穆兄会在埃及成立之初,其创始人哈桑·班纳就对沙特显示出浓厚兴趣,并

① 方金英:《穆斯林与激进主义》,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8 年版;吴云贵、周燮藩:《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吴彦:《沙特阿拉伯政治现代化进程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② Stéphane Lacroix, *Awakening Islam: The Politics of Religious Dissent in Contemporary Saudi Arabia*, George Holoch, tra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Stéphane Lacroix, “Saudi Islamists and the Arab Spring,” Research Paper at Kuwait Program on Development, Governance and Globalization in the Gulf States, Kuwait, May 2014.

③ Olivier Roy, *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Isla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④ Thomas Hegghammer, *Jihad in Saudi Arabia: Violence and Pan-Islamism Since 197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Jon B. Alterman, *Religious Radicalism After the Arab Uprisings*,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5; Robert Lacey, *Inside the Kingdom: Kings, Clerics, Modernists, Terrorists, and the Struggle for Saudi Arabia*, London: Viking Penguin Group, 2009; Madawi Al-Rasheed, *Contesting the Saudi State: Islamic Voices from a New Gener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试图在沙特建立分支机构。穆兄会在沙特的发展历程可分为初步发展、扩张、衰退三个阶段。

(一) 初步发展阶段(1932年至1953年)

1932年至1953年,在沙特的有限许可下,穆兄会在沙特得到了初步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哈桑·班纳与时任沙特国王伊本·沙特建立了友好的私人关系,穆兄会受到沙特政府的资助。1932年,哈桑·班纳在沙特朝觐并为建国不久的沙特国王祈福。这一姿态在当时尤其具有象征意义。一般来说,在伊斯兰教中,只有哈里发才是被祈福的对象。为感谢哈桑·班纳,伊本·沙特国王命令时任财政次大臣穆罕默德·苏鲁尔·法尔罕(Mohammed Srour al-Farham)向穆兄会提供资金支持。1948年,沙特国王还向躲避埃及政府追杀、逃亡到沙特的哈桑·班纳提供出行车辆和私人护卫,暂时确保了班纳在沙特的安全。^①

第二,穆兄会成员获得沙特政府许可,可在沙特旅行、短暂居留并教沙特人读书识字。同时,沙特也借助穆兄会制衡国内保守的瓦哈比派势力。沙特建国之初,社会发展落后,亟需引进现代物质文明,但遭到瓦哈比派保守宗教势力的强烈反对,该派认为引进现代设施即为“不信道”,穆兄会的支持由此为沙特国王推行现代化政策提供了宗教合法性。^②

然而,即便当时沙特对穆兄会态度友好,也不意味着沙特允许穆兄会在其国境内建立分支机构。1936年,伊本·沙特就以禁止建立政党为由,拒绝了哈桑·班纳在沙特建立分支机构的请求。当穆兄会介入1948年也门军事政变、参与刺杀也门伊玛目并试图在也门建立哈里发国一事败露后,沙特国王便开始将穆兄会视为威胁,同穆兄会断绝官方联系。^③这一情况一直延续至1953年。

(二) 扩张阶段(1953年至1990年)

埃及强人纳赛尔上台后,沙特主动接纳大批被埃及政府镇压的穆兄会骨干、成员,以及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同样遭受打压的穆兄会成员。大批逃亡到沙特的穆兄会成员进入沙特教育领域,获得了扩大影响力的机遇。这一态势一直持续至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

^① Matthew Hedges and Giorgio Cafiero, “The GCC an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 *Middle East Policy*, Vol. 24, No. 1, 2017, p. 130.

^② *Ibid.*, p. 131.

^③ Abdel Latif el-Menawy, “A History of Banning the Brotherhood,” *Al Arabiya*, September 29, 2013, <http://english.alarabiya.net/en/views/news/middle-east/2013/09/29/A-history-of-banning-the-Brotherhood-.html>, 上网时间:2019年11月9日。

第一,穆兄会许多著名人物进入沙特中小学及高校担任教职。20 世纪 50 年代,沙特国内中小学师资匮乏,文盲率高达 85%。大部分从埃及逃亡的穆兄会成员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平,这批人很快在文化水平低、师资匮乏的沙特教育机构占据重要地位。1961 年,沙特王室将整个麦地那伊斯兰大学当做礼物送给了穆兄会,允许他们进行慈善活动,并向他们提供了活动经费。^①1969 年至 1973 年,来自叙利亚的穆罕默德·穆巴拉克(Muhammad al-Mubarak)在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King Abdul Aziz University)麦加分校^②的沙里亚学院担任领导。穆罕默德·库特布(Muhammad Qutb)^③以及后来成为阿富汗“圣战”组织主要领导者的阿卜杜拉·阿扎姆(Abdallah Azzam)^④也曾在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讲学。^⑤

第二,穆兄会成为沙特国内修订教材和制定课程的一支重要力量。1964 年,沙特当局授权穆罕默德·穆巴拉克为麦加的沙里亚学院设计教学课程。由此,穆罕默德·穆巴拉克成为“伊斯兰文化(Islamic Culture)”这门新学科的创始人。他在这门新学科中教授现代伊斯兰史和伊斯兰体系这两门专业课,将穆兄会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植入教材。学习经济学的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就是在“伊斯兰文化”这门学科中受到穆罕默德·库特布和阿卜杜拉·阿扎姆的政治影响。^⑥

1965 年,沙特费萨尔国王成立了一个旨在提升国民教育的专家小组,其中许多穆兄会人士即为该专家小组下属的委员会成员。委员会主导制定了沙特教学大纲《沙特王国教育政策》(Educational Policy in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① 廖百智:《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历史与现实:把脉中东政治伊斯兰走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18 页。

② 1950 年伊本·沙特国王在麦加建立的沙里亚学院,是沙特第一所高等教育机构,也是乌姆·古拉大学(Umm Al-Qura University)的核心院系。1953 年,乌姆·古拉大学设立教师学院(The College of Teachers),负责培训教师。1960 年,教师学院被撤销。1962 年后,培训教师的任务被分配给沙里亚学院(沙里亚学院当时被称为沙里亚与教育学院)。1963 年,沙里亚学院的一部分被拆分出来,组成了教育学院,两个学院独立运行。1971 年,沙里亚学院和教育学院被并入位于吉达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这两个学院共同组成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的麦加分校。参见“Overview of the Umm Al-Qura University”, *Umm Al-Qura University*, <https://uqu.edu.sa/en/main/AboutUs>, 上网时间:2019 年 11 月 20 日。

③ 穆罕默德·库特布为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之弟。

④ 阿卜杜拉·阿扎姆被称为全球“圣战”之父。

⑤ Stéphane Lacroix, *Awakening Islam: The Politics of Religious Dissent in Contemporary Saudi Arabia*, pp. 43-44.

⑥ Ibid., pp. 46-47.

该教学大纲对伊斯兰概念的解释掺杂了穆兄会的意识形态。随着新教育政策的施行,穆兄会推动了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的伊斯兰化。一些高校成立了伊斯兰经济学系、伊斯兰心理学系和伊斯兰社会学系,穆兄会成员在其中参与教学或组织活动。^①

第三,除了在伊斯兰文化和伊斯兰社会科学领域外,穆兄会还对宗教学领域发挥着显著影响。当时,有不少穆兄会成员在沙特高校教授经注学^②和伊斯兰法学。1977年至1978年,埃及穆兄会成员成为沙特伊玛目大学经注学系的领导人,该系其他8名来自埃及和叙利亚的教师也赞同穆兄会思想。^③仅有教义学这门学科由瓦哈比派乌里玛绝对掌控,没有穆兄会成员参与。20世纪70年代,沙特高校出现两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教学中心,一个是瓦哈比教义学中心,另一个是聚焦于伊斯兰文化的穆兄会中心。但“两强并立”的时间并不长,穆兄会中心将其影响力扩大到其他系,甚至渗透进瓦哈比教义学中心。萨法尔·哈瓦利(Safar al-Hawali)就曾对穆罕默德·阿明·马斯里(Muhammad Amin al-Masri)^④称赞道:“他做出巨大努力,才使得‘现代思想流派(Contemporary Schools of Thought)’被确定为教义学的指定教学内容。教义学这门课本应由具有现代伊斯兰思想的穆罕默德·库特布教授来授课”。^⑤20世纪80年代,由穆罕默德·库特布指导毕业的学生也在各自任教的学校教授“现代思想流派”,继续传播穆罕默德·库特布的思想。

总的来说,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尤其是费萨尔国王时期,沙特高校聚集了一批从叙利亚、埃及、约旦等国流亡而来的穆兄会教师。^⑥此外,沙特王室还支持穆兄会成员参与创建由沙特资助的伊斯兰慈善组织和机构,其中包括1961年成立的“世界穆斯林联盟”(Muslim World League)和1972年成立的“世界穆斯林青年大会”(World Assembly of Muslim Youth)。^⑦

① Stéphane Lacroix, *Awakening Islam: The Politics of Religious Dissent in Contemporary Saudi Arabia*, p. 47.

② 即《古兰经》注释学。

③ Stéphane Lacroix, *Awakening Islam: The Politics of Religious Dissent in Contemporary Saudi Arabia*, p. 47.

④ 穆罕默德·阿明·马斯里是来自叙利亚的穆兄会成员。

⑤ Stéphane Lacroix, *Awakening Islam: The Politics of Religious Dissent in Contemporary Saudi Arabia*, p. 47.

⑥ 方金英:《穆斯林与激进主义》,第156页。

⑦ Matthew Hedges and Giorgio Cafiero, “The GCC an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 p. 131.

(三) 衰退阶段(1990 年至今)

自 1990 年以来,穆兄会逐渐遭到沙特的削弱和遏制,其在沙特的活动空间因受到限制而步入衰退阶段。2014 年,随着沙特将穆兄会列为“恐怖组织”,沙特穆兄会遭到全面打压。

第一,1990 年海湾战争爆发后,穆兄会强烈反对美国在沙特驻军。随着公开质疑沙特王室统治合法性的“觉醒运动”兴起,沙特将矛头之一指向穆兄会,将穆兄会作为重点打击对象,驱逐了许多长期逗留在沙特境内的穆兄会成员。^① 自阿富汗返回的“圣战”分子在沙特发起多次恐怖袭击后,沙特对穆兄会采取了更加敌视的政策。20 世纪 90 年代晚期,沙特大穆夫提阿卜杜·阿齐兹·本·巴兹(Abdul Aziz bin Baz)斥责穆兄会为叛教者。2002 年,时任沙特王储纳伊夫(Nayef)谴责穆兄会背叛海湾国家,是“王国的万恶之源”。^② 沙特还支持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等国镇压穆兄会。

中东剧变后,沙特对穆兄会采取了更加严厉的遏制和打压政策。2014 年 2 月 4 日,沙特政府发布一则王室令(Royal Decree),宣布“将对具有极端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宗教人士或同情极端主义思想和行为者处以 3 年以上、20 年以下监禁”^③。其中,“具有极端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即指穆兄会或受穆兄会影响的知识分子。就职于“使命”电视台(Al-Risala TV)的塔里克·苏维丹(Tareq al-Suwaidan)就因被指责参与“穆兄会恐怖活动”而被电视台辞退。在沙特政权的警告和威慑下,约有 2.5 万名穆兄会成员不得不取消集会,尽量保持低调。^④

第二,2014 年 3 月 7 日,沙特正式认定穆兄会为“恐怖组织”,并在国内大规模搜捕、镇压穆兄会成员及其支持者,穆兄会在沙特的处境急剧恶化。与穆兄会有关的人士遭到沙特当局监禁或被判处死刑,与穆兄会相关的书籍被没收和销毁。萨法尔·哈瓦利、萨勒曼·奥达(Salman al-Ouda)等 37 名具有穆兄会思想的宗教学者皆受到监禁和刑罚。2015 年 12 月,沙特要求所有学校、图书馆和研究中心销毁由穆兄会成员或与其有关联学者出版的书籍,其中包括尤素福·格

① Matthew Hedges and Giorgio Cafiero, “The GCC an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 p. 133.

② John Jenkins, “The Gulf an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Foreign Policy Trends in the GCC States*, Autumn 2017, p. 31.

③ Stéphane Lacroix, “Saudi Arabia’s Muslim Brotherhood Predicament,”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20,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nkey-cage/wp/2014/03/20/saudi-arabias-muslim-brotherhood-predicament/>, 上网时间:2019 年 11 月 8 日。

④ Jon B. Alterman and William McCants, “Saudi Arabia: Islamists Rising and Falling,” in Jon B. Alterman, *Religious Radicalism After the Arab Uprisings*, pp. 163–164.

尔达维(Yusuf al-Qaradawi)、赛义德·库特布和哈桑·班纳撰写的书籍。^①至今,穆兄会仍未能在沙特进行公开活动。

二、穆兄会与沙特关系的演变

自1932年穆兄会进入沙特至1953年,沙特当局一直严格限制穆兄会在沙特建立分支。1953年以后,沙特和穆兄会逐渐形成了既合作、又相互利用的盟友关系。在1990年至2013年期间,二者关系日趋恶化。自2014年沙特将穆兄会列为“恐怖组织”以来,二者关系彻底破裂。由于1932年至1953年穆兄会在沙特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穆兄会和沙特的交往相对较少,因此笔者着重论述1953年后二者关系的演变。

(一) 合作与相互利用的盟友关系

1953年至20世纪90年代以前,沙特与穆兄会结成了“盟友和伙伴”的关系,二者通过相互利用来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对沙特来说,穆兄会是其反制埃及纳赛尔政权的有力武器,可为其引进现代设备和开展现代化建设提供宗教合法性支持,穆兄会遍布中东乃至伊斯兰世界的社会网络还有助于其提升影响力。对穆兄会来说,沙特政权的庇护可使其保持有生力量,来自沙特的资金支持可以帮助其不断地扩大“全球网络”,促进其思想观念在伊斯兰世界的传播。

第一,二者具有反对纳赛尔及其政权的共同需求。纳赛尔掌权后,穆兄会在埃及成为碎片化的非法组织,其骨干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不少成员逃往海湾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国家。^②纳赛尔利用“阿拉伯之音”广泛传播泛阿拉伯主义、世俗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鼓动推翻君主统治,建立共和制。1962年也门战争爆发,埃及和沙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由此,被纳赛尔打压的穆兄会和受到纳赛尔攻击的沙特之间的合作增强,二者遂结成盟友来共同应对纳赛尔政权带来的威胁。

^① Khalid al-Shayea, “Saudi Arabia Has Pulled a List of Books, Many by Muslim Brotherhood Scholars from Its Schools, Causing Heated Debate Around the Decision,” *The New Arab*, December 3, 2015, <https://english.alaraby.co.uk/english/news/2015/12/3/blacklisting-of-books-in-saudi-arabian-schools-causes-controversy>, 上网时间:2019年11月11日。“80 Books Promoting Brotherhood Banned,” *Arab News*, December 2, 2015, <https://www.arabnews.com/featured/news/844241>, 上网时间:2020年12月5日。

^② 毕健康:《试论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二重性问题》,载《世界历史》2004年第1期,第98页。

一方面,具有丰富抗争经验的穆兄会弥补了沙特传统瓦哈比派乌里玛无法与纳赛尔进行大规模论战的短板。沙特将在其国内避难的穆兄会成员组织起来,让其负责多种外宣平台,如“伊斯兰之音”(Voice of Islam)广播电台和 1962 年建立的第一座电视台。沙特报纸刊文称纳赛尔是“埃及的斯大林”。^① 另一方面,沙特让在其国内避难的穆兄会成员参与创建以沙特为基地的跨国伊斯兰慈善机构,试图“加强伊斯兰团结,维护和帮助世界各国的伊斯兰组织和事业,致力于伊斯兰教的传播并提高穆斯林在各国的地位,从而维护沙特的君主政权统治”。^② 其中,哈桑·班纳的女婿赛义德·拉马丹(Said Ramadan)和约旦人卡米勒·谢里夫(Kamil al-Sharif)是世界穆斯林联盟的重要创始人。^③ “1961 年,沙特王室将整个麦地那伊斯兰大学当作礼物送给穆兄会,允许他们进行慈善活动,并向他们提供活动经费。”^④

与此同时,穆兄会的意识形态在沙特境内得以传播。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由于沙特出现阿拉伯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左翼思想,费萨尔允许穆兄会在其国内开展宣传活动。之后,穆兄会成员被允许参与王国内部事务,通过广播、公开演讲和出版书籍等在城市中心地区开展宣传与大众动员活动。^⑤ 苏丹哈桑·图拉比(Hasan al-Turabi)等人仇视西方文化以及推崇原教旨主义的思想在沙特逐步传播开来。^⑥

第二,沙特依靠穆兄会来为其现代化政策提供合法支撑。石油开采及其巨额石油收入,使沙特迅速走上现代化道路。但由于瓦哈比乌里玛对现代事务了解较少,沙特国内掌握现代技术的人才储备有限,人数有限的青年知识分子则需从事行政和管理工作。这使得大多为大学毕业生的穆兄会成员成为沙特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费萨尔国王采纳了穆兄会“伊斯兰现代化”的观点。对费萨尔国王来说,如同穆斯林改革主义者对其父伊本·沙特国王具有重大意义一样,

① Stéphane Lacroix, *Awakening Islam: The Politics of Religious Dissent in Contemporary Saudi Arabia*, pp. 41-42.

② 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与世界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74 页。

③ Stéphane Lacroix, *Awakening Islam: The Politics of Religious Dissent in Contemporary Saudi Arabia*, p. 42.

④ 廖百智:《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历史与现实:把脉中东政治伊斯兰走向》,第 218 页。

⑤ Mike Kelvington, “Importing the Muslim Brotherhood: Creation of the ‘Sahwa’ in Saudi Arabia,” *The Havok Journal*, April 27, 2019, <https://havokjournal.com/word/middle-east/importing-muslim-brotherhood-creation-sahwa-saudi-arabia/>, 上网时间:2019 年 11 月 11 日。

⑥ Hillel Frisch and Efraim Inbar, *Radical Isla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 76.

穆兄会对他推动现代化也同样重要。^①从某种程度上看,穆兄会是沙特现代化进程的有力支持者。^②

第三,沙特利用穆兄会的跨国界网络将其国内兴起的激进主义思想导流至国外。1979年伊朗爆发的伊斯兰革命使沙特受到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强烈冲击,越来越多的舆论开始谴责沙特君主制违反伊斯兰教。^③反政府动乱很快在沙特爆发。1979年11月20日,在激进分子朱海曼·欧泰比(Johaiman al-Qtaybi)的率领下,由沙特人、埃及人等组成的约500名激进分子^④,攻占麦加禁寺,与政府进行武装对抗,要求回归伊斯兰原初教义,废除腐败的、将西方文明引入伊斯兰圣地并逐步走上亲美道路的沙特王室,还谴责沙特宗教阶层违背职责,成为王室的附庸。^⑤与此同时,沙特东部哈萨地区的什叶派穆斯林也在伊朗输出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发动了反对沙特王室统治的示威抗议运动。

为缓和国内紧张局势,沙特国王整治了王室的挥霍和腐败现象,也采取了措施来加强国家的伊斯兰特征,^⑥但这仍不能遏制激进主义思想的蔓延。沙特政治反对派认为,瓦哈比派是王室政权的同盟者,国王的举措毫无意义。于是,沙特采取将国内矛盾转移至国外的策略,希望借助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一契机实现“祸水东引”,通过满足伊斯兰主义者的诉求来增强王室统治的宗教合法性。其中,穆兄会的跨国网络及其较为强大的动员能力恰好为沙特所用。由此,沙特给予穆兄会支持,鼓励其把成批带有激进思想的“圣战者”和武器运往阿富汗。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阿卜杜拉·阿扎姆。沙特曾以阿扎姆与麦加禁寺事件有关为由将其驱逐出境,但却大力支持他招募思想激进者并带领他们前往阿富汗发动抗苏“圣战”运动。阿扎姆在这一过程中成为本·拉登的精神导师,并与后者成立“圣战者服务处”,为“基地”组织的创建奠定了基础。^⑦通过这种方式,激进主义者被分流至国外,沙特国内紧张局势暂时得到缓解。

① Stéphane Lacroix, *Awakening Islam: The Politics of Religious Dissent in Contemporary Saudi Arabia*, p. 43.

② Adli Sadeq, “Saudi Arabia an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 Relationship to Be Restored,” *Middle East Monitor*, July 23, 2015, <https://www.middleeastmonitor.com/20150723-saudi-arabia-and-the-muslim-brotherhood-a-relationship-to-be-restored/>, 上网时间:2019年11月13日。

③ 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与世界政治》,第227页。

④ 其中很多是来自麦地那伊斯兰大学的穆兄会激进分子。参见[美]詹姆斯·温布兰特:《沙特阿拉伯史》,韩志斌、王泽壮、尹斌译,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267页。

⑤ 方金英:《穆斯林与激进主义》,第228页。

⑥ 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与世界政治》,第228-229页。

⑦ 方金英:《穆斯林与激进主义》,第154-157页。

然而,沙特矛盾外引的做法实为“饮鸩止渴”。正如法国著名学者奥利维尔·罗伊(Olivier Roy)所说,“20世纪80年代,沙特和穆兄会结成了一种近似‘联合冒险’的关系。穆兄会同意不在沙特境内开展活动,仅在沙特与国外伊斯兰主义运动之间扮演中间人角色。但穆兄会在决定哪个组织和个人能获得沙特资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①这意味着,对资金具有一定分配权的穆兄会可以轻易输出其意识形态。另外,穆兄会及其意识形态在沙特社会的传播,也导致沙特伊斯兰教的政治化。^②二者的脆弱同盟关系随着外部威胁减小、“圣战”分子回流以及极端思想的倒灌而破裂。

(二) 疏远与恶化的对手关系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穆兄会转变发展战略。它放弃暴力,接受多元民主思想,试图通过参与议会政治和合法的议会斗争来夺取权力,形成了独特的“伊斯兰民主观”,并成长为一股强大的政治伊斯兰力量。穆兄会新形成的参与议会斗争和“伊斯兰民主”的思想观念对沙特君主统治及其官方瓦哈比意识形态构成了严重威胁。由于二者对1990年海湾战争存在意见分歧,穆兄会和沙特的关系渐趋疏远。中东剧变后,二者关系进一步恶化。

第一,沙特国内接受穆兄会思想的宗教政治反对派发起伊斯兰“觉醒运动”,从思想和政治实践两方面挑战了沙特的政权合法性。“觉醒运动”中的一个组织甚至以“沙特穆兄会”来命名。^③

从思想上看,沙特的穆兄会成员把穆兄会的现代主义和传统的瓦哈比意识形态相结合,严重冲击了传统上支持王室的瓦哈比派以及沙特的政教联盟体制。^④萨法尔·哈瓦利和著名宗教反对派人士萨勒曼·奥达等人强烈谴责沙特建制派乌里玛,称其为“西方”和“世俗主义者”的奴仆。他们认为,1990年海湾战争是西方对伊斯兰国家的进攻,应该推翻未能在战争中维护穆斯林和伊斯兰世界利益的沙特王室,改由伊斯兰组织执政。^⑤

从政治实践上来看,部分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发起公开请愿活动,要求进

① Olivier Roy, *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Isla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17.

② Stéphane Lacroix, “Saudi Arabia’s Muslim Brotherhood Predicament”.

③ 需要指出的是,“沙特穆兄会”独立于埃及穆兄会,既不效忠于开罗,也不遵从开罗的指令。参加 Stéphane Lacroix, “Saudi Arabia’s Muslim Brotherhood Predicament”.

④ Wojciech Grabowski,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the Crisis in the GCC: Root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Stosunki Międzynarodowe*, Vol. 2, No. 52, 2016, p. 358.

⑤ Hillel Frisch and Efraim Inbar, *Radical Isla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p. 79.

行政改革。1991年2月,不满沙特与美国结盟的知识分子向时任国王法赫德提交“请愿书”,要求沙特实行民主改革。5月,来自社会各阶层的500多名宗教界人士通过沙特大穆夫提伊本·巴兹向法赫德国王呈交“劝告备忘录”,质疑沙特王室统治的合法性、要求限制王室权力、实行广泛的政治改革。^①而在沙特统治集团看来,“觉醒运动”是穆兄会异化的产物,保守的瓦哈比派教士也抨击它是“沙特版本的穆兄会”。^②面对政治反对派和宗教界的压力,沙特国王实行了部分改革。^③但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沙特已不愿再容忍“觉醒运动”的挑衅,开始压制“觉醒运动”参与者并驱逐穆兄会成员。穆罕默德·库特布即是被驱逐的人员之一。^④

第二,在中东剧变中,穆兄会势力迅速壮大。穆兄会“伊斯兰革命”的主张引发沙特对其领导地位和政权安全的担忧,二者关系进一步恶化。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穆兄会2000年以来通过参与选举政治逐渐进入多个国家的权力中心,并在2011年地区动荡中急剧扩张。2002年,与穆兄会政治理念较为接近的正义与发展党成功问鼎土耳其政权;2005年,穆兄会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在埃及大选中获得88个席位,成为埃及最大的反对党;2006年,前身为埃及穆兄会巴勒斯坦分支的哈马斯在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击败法塔赫;2011年,突尼斯“复兴运动”在制宪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不仅如此,与穆兄会有组织的组织或政党还在阿联酋、科威特和沙特密谋策划反对各国统治集团。穆兄会势力的壮大促使这三个国家于2011年拉响“穆兄会接管政权”的警报。^⑤更严峻的是,随着埃及穆巴拉克政权被推翻,穆兄会在2012年掌管埃及政权。沙特失去了自1979年以来共同对抗伊朗的政治盟友,其外部安全环境急剧恶化。此外,埃及穆尔西政权大打“穆兄会外交牌”,不仅和卡塔尔保持密切联系,还与伊朗建立了友好兄弟关系,并实现1979年以来的首次互访。^⑥

① 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80页。

② Matthew Hedges and Giorgio Cafiero, “The GCC an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 p. 131.

③ 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第480页。

④ Matthew Hedges and Giorgio Cafiero, “The GCC an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 p. 133.

⑤ Eugenio Dacrema, “New Emerging Balances in the Post-Arab Spring: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the Gulf Monarchies,” *Istituto Per Gli Studi Di Politica Internazionale*, No. 155, January 2013, p. 4.

⑥ 柳洪杰:《穆尔西抵达伊朗:埃及总统33年来实现首访》,中国日报网,2012年8月30日,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zx/2012-08/30/content_15720677.htm, 上网时间:2019年11月15日。

从政权安全角度来看,穆兄会在沙特国内鼓动宗教政治反对派,严重触犯了沙特禁忌,威胁了统治集团的权威。曾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转入地下的沙特“觉醒运动”成员把“阿拉伯之春”视为再次进入沙特政治权力中心的绝佳机会。他们与自由主义者、世俗主义者、工人、劳工联盟活动家、女性主义者联合起来,主导着公共舆论并呼吁改革。^① 2011 年 2 月 10 日,与“觉醒运动”关系密切的伊斯兰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建立了沙特历史上第一个政党——“伊斯兰乌玛党”(Hizb al-Umma al-Islami)。该党要求实现议会选举,任命一位与国王无关且只对议会负责的总理。^② 包括萨勒曼·奥达在内的“觉醒运动”著名领导人在网上发起请愿活动,要求“建立权力和制度完善的国家”,呼吁“改革”。^③ 尽管“伊斯兰乌玛党”的创建者和请愿活动召集者很快被沙特当局逮捕,但这些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觉醒运动”反对派已经获得一定的政治资本,对沙特王室和宗教上层人士构成了一定威胁。

1990 年至 2013 年,沙特和穆兄会的关系不断疏远和恶化。沙特当局专注于打击其国内穆兄会以及穆兄会的支持者,未和地区范围内的穆兄会发生公开冲突,二者之间仍然保持一定的沟通和交流。例如,穆尔西当选埃及总统后,时任沙特国王阿卜杜拉邀请穆尔西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穆尔西访问沙特期间,沙特同意向埃及中央银行提供 10 亿美元资金、5 亿美元经济援助,还准备拨款 2.5 亿美元,以便向埃及出口天然气^④。穆尔西承诺“不输出革命”,在就任总统 12 天后便将沙特作为首次出访的国家,这足以说明穆尔西对沙特的重视及其强化与沙特关系的愿望。

(三) 持续恶化的敌对关系

2014 年 3 月 7 日,穆兄会被沙特内政部列为“恐怖组织”,沙特和穆兄会的矛盾全面公开化。在地区层面,沙特支持埃及军方强力压制穆兄会,并向与穆兄会维持友好关系的卡塔尔施压,最大限度地压缩穆兄会的发展空间。在埃及军方罢黜穆尔西政权后,沙特联合阿联酋迅速向埃及过渡政府提供了 120 亿美元的

^① Beverley Milton Edwards, *The Muslim Brotherhood: The Arab Spring and Its Future Face*,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 176.

^② Wojciech Grabowski,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the Crisis in the GCC: Root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p. 359.

^③ Matthew Hedges and Giorgio Cafiero, “The GCC an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 p. 133.

^④ 石页:《穆尔西“处女访”给了“传统密友”沙特》,载《青年参考》2012 年 7 月 18 日,第 7 版。

资金支持。^① 沙特还打击穆兄会在利比亚和巴勒斯坦的分支机构。在利比亚,沙特支持由哈利法·哈夫塔尔(Khalifa Haftar)将军领导的“利比亚国民军”(Libya National Army),打击具有穆兄会背景的“民族团结政府”。在巴勒斯坦,沙特将作为穆兄会分支的 Hamas 列为“恐怖组织”,并于 2019 年 5 月 10 日将 Hamas 骨干列入 40 人恐怖分子“黑名单”,其中包括 Hamas 创始人艾赫迈德·亚辛(Ahmad Yassin)、前任领导人哈立德·马沙尔(Khaled Meshaal)和现任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Ismail Haniyeh)。^② 在卡塔尔,早在 2014 年 3 月,沙特就通过召回驻卡大使来向卡塔尔施压,要求其停止援助穆兄会。^③ 2017 年 6 月 5 日,沙特增加对卡塔尔的施压力度,不仅宣布与其断绝外交关系,还对其进行一系列封锁。

在国内,沙特政府官员在多个场合指责穆兄会为“恐怖组织”。一位沙特官员说道:“早该将穆兄会列为恐怖组织了。我们居然为国外的穆兄会成员敞开学校的大门,允许他们向我们的青年灌输其思想观念。我们这么晚才意识到,实为不幸。”另一位官员表示:“一些穆兄会成员颁布的法特瓦毁坏了伊斯兰的声誉,影响了沙特在国际社会的形象,沙特决不允许任何破坏国家稳定的企图得逞。”^④ 沙特王室的一位成员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道:“穆兄会是恐怖分子的培养皿”,该成员还强调,“奥萨马·本·拉登是穆兄会成员,IS 的巴格达迪也是穆兄会成员。如果认真查询每一个恐怖分子的资料,你会发现他们都是穆兄会成员”。^⑤

① Guido Steinberg, “Leading the Counter-Revolution: Saudi Arabia and the Arab Spring,” *Germ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 June 2014, pp. 17–18, https://www.swp-berlin.org/fileadmin/contents/products/research_papers/2014_RP07_sbg, 上网时间:2020 年 1 月 10 日。

② Adnan Abu Amer, “Hamas Is Worried and Silent About Saudi Arabia’s Policy Towards It,” *Middle East Monitor*, May 15, 2019, <https://www.middleeastmonitor.com/20190515-hamas-is-worried-and-silent-about-saudi-arabias-policy-towards-it/?fbclid=IwAR11bkeK06gILhaYF-UslYNE-Uuu79ET00VvEaAq65cY92UtiNqfqVbiYhXg>, 上网时间:2020 年 1 月 18 日。

③ Madawi Al-Rasheed, “Saudi-Qatar Tensions Divide GCC,” *Al-Monitor*, March 6, 2014, <https://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4/03/saudi-qatar-gcc-tensions-islamist.html>, 上网时间:2020 年 1 月 18 日。

④ Mustapha Ajbaili, “Saudi: Muslim Brotherhood a Terrorist Group,” *Al Arabiya English*, March 7, 2014, <http://english.alarabiya.net/en/News/middle-east/2014/03/07/Saudi-Arabia-declares-Muslim-Brotherhood-terrorist-group.html>, 上网时间:2019 年 11 月 23 日。

⑤ Mohamed Mokhtar Qandil,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Saudi Arabia: From Then to Now,”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May 18, 2018,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fikraforum/view/the-muslim-brotherhood-and-saudi-arabia-from-then-to-now>, 上网时间:2020 年 5 月 24 日。

沙特教育部则着手清除渗透进教材及各类书籍的穆兄会思想。支持穆兄会或受到穆兄会思想影响的人员遭到了严厉打击。例如,任教于沙特国王大学的穆罕默德·阿里菲(Muhammad al-Arifi)被辞退。^①沙特的这些举动使穆兄会受到沉重打击。穆兄会愤怒地指斥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ad bin Salman),称该王储“不停地撒谎、不断地散布关于穆兄会的虚假消息,并将穆兄会与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他的这种做法只不过是期望通过获得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好感来得利,而这将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他不是通过自己当之无愧的政绩,而是通过屈辱的让步。”^②

总的来看,自 1953 年以来,穆兄会和沙特的关系经历了从盟友向对手和敌人的演变。二者关系的变化主要取决于以下四大因素。

第一,沙特政权利益的维护。沙特是在瓦哈比派教义基础上创建的政教合一的君主制国家。宗教、王权、部落家族是构成沙特国家政治稳定的三大支柱,其中瓦哈比派伊斯兰教与沙特家族统治从宗教和传统两方面为沙特君主制政权的稳定和巩固提供了坚实基础。^③作为“两圣地的仆人”,沙特的政权合法性和国家利益在于坚持伊斯兰教义,保持国家和社会的伊斯兰特色,抵御世俗主义、社会主义和共和制。当沙特面临来自奉行世俗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的埃及纳赛尔共和政权的威胁时,穆兄会就成为沙特的政治盟友;当穆兄会的意识形态成为沙特宗教政治反对派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并威胁沙特的政权安全时,穆兄会就成为沙特打击的对象。

第二,与官方瓦哈比派的关系。瓦哈比派教义是沙特的官方教义,瓦哈比派和沙特政权是“二元一体”的宗教—政治联盟关系。瓦哈比派强调对君主忠诚,而穆兄会反对人治,严格遵守“真主主权”和对超越民族、地域和血缘的乌玛的忠诚。这意味着二者具有内在张力,很容易产生冲突和对抗。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瓦哈比派排斥一切现代器物 and 文明,对现代化具有强烈现实需求的沙特被迫向主张学习西方物质文明的穆兄会寻求支持,暂时压制了穆兄会与瓦哈比派的冲突,使得双方呈现出一种合作的盟友关系。随着穆兄会在沙特社会和教育领域的意识形态渗透逐渐加深,其与官方瓦哈比派的矛盾急剧凸显,并从根本上危及沙特的政教联盟关系,沙特王室便强化了瓦哈比派的地位,沙特与穆兄会

① Wojciech Grabowski,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the Crisis in the GCC: Root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p. 361.

② Mohamed Mokhtar Qandil,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Saudi Arabia: From Then to Now”.

③ 曲洪:《伊斯兰:观察与思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70-172 页。

的关系出现恶化。

第三,现代化进程中下层民众的不满。沙特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导致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平等现象突出,产生了一批不满现状和要求变革的下层平民。相较于代表精英和统治集团的官方瓦哈比主义,注重社会下层的穆兄会获得传播其意识形态的机会。长期潜伏于沙特教育领域的穆兄会成员或亲穆兄会者将其激进思想和瓦哈比派的原旨教义有机结合,要求“通过‘圣战’建立真正的伊斯兰国家。由此,被称为‘新瓦哈比派’或‘新伊赫万运动’的武装叛乱集团形成”^①。穆兄会和沙特国内不满现状者形成联盟,严重挑战了沙特政权的统治基础。这是导致沙特和穆兄会后来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

第四,穆兄会宗教政治思想的演变和分化。如果说沙特的现实政治需要是二者关系变化这枚硬币的一面,那么穆兄会宗教政治思想变化则是另一面。在纳赛尔政权的打压下,穆兄会发生温和化和激进化的分化。一方面,自哈桑·胡代比(Hassan al-Hudaybi)承认世俗社会合法性以及认可政党和多党制的政治理念^②以来,作为主流的温和派逐渐走上参与议会政治的道路,试图通过和平方式来夺取政权,其伊斯兰民主政治模式产生巨大影响力。但穆兄会组建政党和参与议会政治的战略不仅在沙特国内激起要求政治改革的连锁反应,而且还挑战了沙特伊斯兰君主统治模式和瓦哈比官方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赛义德·库特布提出了以暴力手段推翻世俗政权的反国家、反社会的极端主义思想,这一思想在沙特的传播同样威胁着沙特王室的统治。因此,无论穆兄会宗教政治思想走向温和化还是激进化,都不可避免地导致穆兄会和沙特的关系走向敌对。

三、穆兄会对沙特内政外交的影响

在沙特王国的政治环境中,穆兄会不可能通过组建政党成为沙特的一支政治力量,但穆兄会在沙特的长期存在仍然对沙特内政外交产生重要影响。对沙特而言,穆兄会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带来积极影响,也产生消极影响。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穆兄会对沙特的积极影响多于消极影响。其中的积极影响主要有:穆兄会帮助沙特抵抗来自埃及纳赛尔的攻击,促进实施泛伊斯兰主义战略,扩大了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消极影响主要有:穆兄会库特布极端思

^① 金宜久:《伊斯兰与国际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1页。

^② 易小明:《政治伊斯兰和世俗政党关系——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为例》,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3期,第37-38页。

想为沙特国内宗教政治反对派的兴起提供了思想武器。海湾战争后,穆兄会对沙特的危害凸显,消极影响急剧上升,积极影响日益减弱。库特布的宗教极端思想和沙特本土原始瓦哈比主义^①的融合,激活了曾经被瓦哈比派废弃的“圣战”思想,沙特受到极端主义思想和恐怖袭击行动的危害。中东剧变后,穆兄会还成为卡塔尔用来争夺地区领导权、削弱沙特地区影响力的工具。

(一) 为沙特对抗纳赛尔世俗政权和推行泛伊斯兰主义战略提供支持

意识形态是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为国家追求国家利益提供思想指导,还是国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道义外衣。

第一,穆兄会是沙特抵制埃及纳赛尔对其君主制进行攻击的有力武器。20世纪50年代初,阿拉伯民族主义高涨,纳赛尔掌握埃及政权后,一批新的共和制国家陆续建立。先后于1958年、1962年和1967年成立的伊拉克共和国、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以及南也门人民共和国,从东西两面包抄,对沙特几近形成合围之势。而当时瓦哈比派的影响力主要限于阿拉伯半岛地区,并不能很好地配合沙特政权抵抗纳赛尔泛阿拉伯主义的强烈冲击。于是,穆兄会成为沙特用来与埃及进行竞争的重要工具。沙特庇护和资助了一批来自埃及的穆兄会成员,使得埃及穆兄会在沙特得以秘密重建。其中一些人潜回埃及,网罗穆兄会中坚分子,加紧行动,不断对抗纳赛尔政权。^②而在沙特的穆兄会成员,则被鼓励将沙特的财富和权力解释为是对沙特虔诚信仰的神圣嘉奖。^③通过扶持对手的对手,沙特守住了对抗纳赛尔的意识形态阵地。

第二,穆兄会是沙特推行泛伊斯兰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穆兄会和瓦哈比教派的主张存在一些共同特征,其中包括信奉逊尼派四大教学法派中最严格的

① 这里的原始瓦哈比主义,指的是沙特建国前在阿拉伯半岛盛行的瓦哈比主义。沙特建国后,放弃了早年瓦哈比派“圣战”的宗教—政治主张,规定在国内的宣教布道上不得鼓吹“圣战”思想,反对暴力和恐怖主义,禁止以宗教名义干预政治或攻击、诋毁国王和王室。为更好区分本文多次所述“瓦哈比”的不同含义,笔者将沙特建国后官方信奉的相对温和的瓦哈比主义称为官方瓦哈比主义,它与1979年后沙特民间出现的主张通过“圣战”、暴力和恐怖活动建立伊斯兰政权和“伊斯兰国家”的瓦哈比主义不同。金宜久先生将1979年后出现的持“圣战”极端思想、坚持原旨教义的瓦哈比派称为“当代瓦哈比派”。文中提及的“瓦哈比派”皆指沙特官方瓦哈比主义,偶有提及的“原始瓦哈比主义”指的是沙特建国前出现的瓦哈比主义,而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出现的反对沙特王权,主张干预政治的瓦哈比思想统称为“民间瓦哈比主义”。参见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与世界政治》,第234-245页。

② 杨灏城、朱克柔主编:《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宗教与世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83-384页。

③ Dilip Hiro, *Cold War in the Islamic World: Saudi Arabia, Iran and 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45.

罕百里教法学派。二者激烈反对什叶派和“圣徒”崇拜,主张宗教改革和“净化”宗教,并具有实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共同要求。^①但沙特瓦哈比派强调忠诚于君主,这使其难以在国外广泛流行起来。^②因此,与瓦哈比派有一定共性、寻求将伊斯兰传统和西方政治经验相结合且具有更灵活教义和广泛跨国网络的穆兄会,弥补了这一不足,这为费萨尔的泛伊斯兰主义外交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费萨尔资助建立的众多泛伊斯兰组织中,穆兄会均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包括穆斯林世界联盟和世界穆斯林青年大会。^③这些组织促进了瓦哈比主义的传播,同时也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沙特对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④

(二) 沙特社会宗教氛围趋于保守,宗教政治反对派兴起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逃亡至沙特的许多穆兄会成员信奉库特布的极端思想。在他们的影响下,沙特实行了更加严格的宗教政策,宗教政治反对派逐渐兴起。尽管不能把库特布宗教极端思想对沙特反对派的影响绝对化,也不能将沙特遭受的恐怖主义袭击完全归因于穆兄会,但不能忽视的是,穆兄会尤其是库特布极端思想的传播在其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第一,穆兄会意识形态在沙特的传播对沙特的社会氛围和宗教政策产生一定影响。广泛分布于沙特教育领域的穆兄会成员向学生和青年灌输仇恨西方文化和社会的思想,教导学生有责任也有义务推翻不严格执行沙里亚法的有罪伊斯兰政权和统治穆斯林的异教徒政权,建立以沙里亚法为基础的伊斯兰政权。他们还谴责沙特政权是美国这一异教徒政权的同谋者。^⑤来自叙利亚的许多穆兄会女性成员成功说服了沙特女学生排斥西方文化和佩戴遮盖面部的面纱(Niqab)。^⑥

因受1979年麦加禁寺事件的影响,沙特为维护其伊斯兰世界领导者的形象,陷入了一场争夺伊斯兰教正统性和话语权的无声战争。为回应受到库特布极端

① Olivier Roy, *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Islam*, p. 117.

② Dilip Hiro, *Cold War in the Islamic World: Saudi Arabia, Iran and 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p. 64.

③ Stéphane Lacroix, *Awakening Islam: The Politics of Religious Dissent in Contemporary Saudi Arabia*, p. 42.

④ Hicham Moura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Saudi Arabia," *Ahram Online*, May 15, 2013, <http://english.ahram.org.eg/News/71498.aspx>, 上网时间:2019年11月18日。

⑤ Hillel Frisch and Efraim Inbar, *Radical Isla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p. 76.

⑥ Robert Lacey, *Inside the Kingdom: Kings, Clerics, Modernists, Terrorists, and the Struggle for Saudi Arabia*, London: Viking Penguin Group, 2009, p. 56.

思想和原始瓦哈比主义影响而兴起的宗教极端主义者,沙特哈利德国王及其后继者法赫德国王转向较为原始和保守的瓦哈比主义,在教育和社会管理上执行了更加严格的宗教政策。在教育领域,沙特增加了宗教教育的比重,高中生花在宗教必修课上的时间占比为 1/4,高校里学习伊斯兰教的学生也增多。在社会领域,沙特严格遵守原始瓦哈比教义。店主不得在店内礼拜,必须停止营业前往清真寺礼拜。曾经仅在内志地区执行的男女隔离制度也扩散至沙特其他地区。政府还禁止报纸和电视上出现不遮面的女性。^①

第二,穆兄会促成宗教政治反对派的兴起。在来自埃及、叙利亚等国穆兄会教师的影响下,穆兄会积极参与政治的思想观念被糅合进沙特的民间瓦哈比,使得沙特出现了伊斯兰“觉醒运动”,沙特政权受到政治改革的压力。^② 受到穆兄会思想影响的沙特青年和宗教学者倡导“公民吉哈德”(Civil Jihad),抨击建制派乌里玛,还试图模仿埃及穆兄会通过议会选举参与政治,希冀通过和平手段改革沙特现有政治体制,将沙特建成尊重公民权利的君主立宪制伊斯兰国家,实现伊斯兰民主。^③

此外,1993 年 5 月,伊斯兰自由主义者中的 6 名主要成员宣布成立沙特首个人权组织“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Legitimate Right)。这些伊斯兰主义者将反政府活动同世界人权运动挂钩,使沙特政府陷入被动。^④ 曾为沙特穆兄会成员的瓦利德·阿布·哈伊尔(Walid Abu al-Khayr)在 2008 年成立沙特“人权监察”(Monitor of Human Rights)机构。^⑤ 中东剧变后,沙特境内主张以回归传统的宗教形式来推动国内政治变革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再次兴起。

(三) 受库特布思想影响的极端分子对沙特发动恐怖袭击

20 世纪 80 年代,许多从阿富汗返回的极端分子在沙特成立了伊斯兰极端组织,并针对美军、西方人以及沙特安全部队和官员发动恐怖袭击。沙特深受恐怖袭击之害。1996 年,沙特东部城市胡拜尔(Al Khobar)发生汽车爆炸,19 名美军

① Dilip Hiro, *Cold War in the Islamic World: Saudi Arabia, Iran and 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pp. 83-85.

② Thomas Hegghammer, *Jihad in Saudi Arabia: Violence and Pan-Islamism Since 197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4.

③ Stéphane Lacroix, “Saudi Islamists and the Arab Spring,” pp. 2-3.

④ 王铁铮:《浅析九十年代沙特王国的伊斯兰潮》,载《西亚非洲》1996 年第 6 期,第 16 页。

⑤ Stéphane Lacroix, “Saudi Islamists and the Arab Spring,” p. 7.

丧生,近400人受伤。^① 伊拉克战争爆发后,沙特在2003年至2006年遭到一系列重大恐怖袭击。2003年5月和11月,沙特连续遭到多起爆炸袭击事件。^② 排除已被沙特警方挫败的恐怖袭击,从2003年至2007年,仅“基地”组织就在沙特成功实行20至25次大规模恐怖袭击,其中包括5次自杀式重型汽车炸弹袭击,5次多人协作枪击和12次单人暗杀袭击。^③ 2004年,沙特发生了8起针对安全部队和外资企业的恐怖袭击。^④ 2007年后,沙特的恐怖袭击数量减少,但仍有发生。2011年以来,沙特反恐形势再次恶化。2016年,沙特遭遇恐怖袭击数量高达34起。^⑤

沙特政府将国内发生的恐怖袭击直接归因于穆兄会。有人认为,“觉醒运动”作为穆兄会的“变种”,是沙特暴力事件发生的幕后黑手。事实上,“沙特不支持暴力,暴力是由那些20世纪60年代进入沙特的人带来的。”还有人表示,“我们对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感到十分陌生。但它却在学校和清真寺广泛传播,很多年轻人就像高级宗教学者一样在学校和清真寺宣教……他们都是穆罕默德·库特布的学生,到处散布赛义德·库特布和毛杜迪的思想。”^⑥

(四) 中东剧变后穆兄会成为沙特既有外交政策的制约因素

伊斯兰教是沙特在外交政策中用来确保和巩固其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领导地位的重要“软实力”,是维护王室政权的统治及其合法性的工具。然而,穆兄会在沙特庇护下发展壮大后,反而成为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竞争者,制约和阻碍了沙特外交政策的执行。

第一,20世纪90年代穆兄会通过自身的温和化与和平参政议政,在中东国家的影响不断扩大,而沙特实行的政教合一君主制模式的影响力则有所下降。2000年以来,穆兄会或支持穆兄会的政党在一些国家进入政治权力中心。尤其

^① Erica Pearson, “Khobar Tower Bombing of 1996,”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June 18, 2019,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Khobar-Towers-bombing-of-1996>, 上网时间:2019年11月18日。

^② 张金平:《沙特去“极端化”反恐策略评析》,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第5页。

^③ Thomas Hegghammer, “Jihad, Yes, but Not Revolution: Explaining the Extraversion of Islamist Violence in Saudi Arabia,”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6, No. 3, 2009, pp. 401-403.

^④ 马晓燕:《沙特阿拉伯自2003年5月发生血腥连环汽车爆炸事件后频遭恐怖袭击》,载《北京晨报》2004年12月7日,第12版。

^⑤ 《2016年沙特遭遇恐怖袭击34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驻吉达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处,2017年1月11日,<http://jedda.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701/20170102499505.shtml>, 上网时间:2019年12月20日。

^⑥ Madawi AL-Rasheed, *Contesting the Saudi State: Islamic Voices from a New Gener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77-78.

是中东剧变后,“出现政权更迭的阿拉伯共和制国家,都在探索如何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推动伊斯兰民主的建设”^①。尽管沙特支持埃及军方通过“7·15”政变罢黜了穆尔西政权,但穆兄会将其伊斯兰思想付诸政治实践所带来的效应,仍对沙特的政治模式构成潜在威胁。

第二,穆兄会势力的扩大导致沙特与卡塔尔关系持续恶化,沙特的地区领导权和影响力受到严重挑战。对沙特来说,什叶派伊朗是其争夺中东地区领导权和确保伊斯兰世界领袖地位的主要威胁和竞争对手。维持对逊尼派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是沙特与伊朗在竞争与对抗过程中必须掌握的筹码。然而,具有全球网络的穆兄会却在逊尼派伊斯兰世界中打下了多个“楔子”,它在中东多个国家建立分支,组建具有穆兄会性质的政党,并利用局势变化通过政治选举参政或掌握政权,这严重阻碍了沙特外交战略的实施。卡塔尔不仅支持在埃及执政的穆兄会政党、巴勒斯坦的哈马斯,还与由正义与发展党执政的土耳其关系日益密切。^②

由于对穆兄会的立场不同,2017年6月5日,沙特联手阿联酋等国与卡塔尔断交,要求卡塔尔停止支持穆兄会和哈马斯等组织。延续多年的沙特和卡塔尔的断交危机,实际上已导致海合会陷入内部矛盾和分裂,阿拉伯国家整体力量遭到严重削弱。同时,中东地区非阿拉伯国家则利用阿拉伯世界的弱化对其展开争夺,从而导致阿拉伯世界进一步分化。^③对于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环境而言,穆兄会因素的凸显推动了地缘战略竞争更趋激烈,地区安全形势趋于恶化。

总的来说,穆兄会对沙特内政和外交的影响在不同时期表现不同。1953年至1990年,穆兄会与沙特的关系较为积极,穆兄会在沙特反制纳赛尔政权及其推行泛伊斯兰主义战略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不过,穆兄会的意识形态在沙特教育和社会领域的传播潜藏一定风险。1990年以后,穆兄会的消极影响日益凸显,它带来的风险演化为事实上的危害。同时,也正由于穆兄会对沙特政权及其官方瓦哈比主义造成了消极影响,沙特开始严格控制穆兄会的发展规模,并限制其影响力的扩大。因此,相较于海湾等其他国家的穆兄会,沙特的穆兄会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在不允许政党存在和强调王权至上的沙特,穆兄会不可能像在科威特那样以政治反对派的形式参加国会选举,也不可能像在埃及那样通过议会选举

^① 刘中民、赵跃晨:《“博弈”穆兄会与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走势》,载《外交评论》2018年第5期,第79页。

^② 吴冰冰:《中东地区的大国博弈、地缘战略竞争与战略格局》,载《外交评论》2018年第5期,第57-58页。

^③ 同上,第61页。

参政或上台执政,更不可能像在卡塔尔那样通过放弃组织党派、避免参与其国内事务而“与王室和政府保持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①成为政府的合作者和支持者。

四、结语

沙特与穆兄会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建立联系,二者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合作与相互利用的盟友关系向疏远与对抗的对手和敌人关系的转变。沙特建国初期对来自埃及等国穆兄会的接纳和庇护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和实用主义色彩。穆兄会为沙特抵抗来自纳赛尔泛阿拉伯主义和世俗主义的威胁发挥了重要作用,其跨国网络为沙特的泛伊斯兰主义外交提供了重要支持,其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实用主义态度为沙特的现代化改革增添了助力。然而,沙特在利用穆兄会实现其政策目标的同时,穆兄会也利用沙特的资金和庇护将其思想观念输入到教育领域这一意识形态竞争的关键阵地。它还与沙特社会中的不满现状者结盟,形成了对沙特政权构成重大威胁的宗教政治反对派。此外,一些接受库特布极端主义思想的沙特人自阿富汗返回后将沙特政权作为“圣战”对象,这导致沙特自身也深受恐怖主义袭击之害,令沙特政权始料未及。

对沙特来说,维持与瓦哈比派的政教联盟是其立国之根、治国之本,保持对教权的控制,使教权服从王权是题中之义。沙特对穆兄会的态度和穆兄会在沙特的发展状况取决于穆兄会能否服务于沙特的泛伊斯兰主义对外战略及其国家利益。当穆兄会以及受其影响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对沙特王权构成威胁,阻碍其地区战略的实行时,沙特会果断地对其进行打击。正是由于中东剧变以来穆兄会在地区范围内推行伊斯兰民主模式,与沙特的战略竞争者和对手保持密切联系,导致 2014 年沙特将穆兄会列为“恐怖组织”,并于 2017 年 6 月不惜冒着海合会瘫痪的代价与卡塔尔断交。从阿拉伯整体视角来看,穆兄会因素给海湾和更大范围的阿拉伯国家带来了分化,这不利于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和地区安全环境的构建。

(责任编辑:李 意 责任校对:邹志强)

^① 刘辰:《卡塔尔穆斯林兄弟会与政府的特殊关系及其影响》,载《西亚非洲》2019 年第 3 期,第 143 页。